

地区腐败、政治攀附与企业竞争策略：关系导向 VS 创新驱动？

□ 徐细雄 李万利^①

摘要：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环境制约并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资源配置。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6~2014年数据实证考察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关系导向VS创新驱动）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腐败是驱动我国企业进行政治攀附并忽视创新投入的重要制度诱因。具体来讲，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其越倾向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并抑制“创新驱动”策略；而且，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地区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强度更大。我们还发现，腐败环境下的企业政治攀附与关系策略行动确实降低了其面临的政治攫取风险，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优惠。本研究揭示了企业竞争策略选择潜在的制度成因，从制度视角为我国企业“重关系、轻创新”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合理解释；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丰富了腐败主题的研究文献。

关键词：地区腐败；竞争策略；关系导向；创新驱动；政治攀附

一、引言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企业缺乏创新依然广受

^① 徐细雄、李万利（E-mail: liwanli1989@163.com），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宗教传统、隐性规则与企业非伦理行为：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71572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儒家传统、隐性规则与企业非伦理行为：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理论实证研究”（17YJA630017）和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FO性别与公司现金持有决策：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视角的研究”（CYB17031）资助。

诟病^①。创新不足既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也对国家综合竞争力造成消极影响。随着中央政府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并出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系列支持政策，使我国企业创新现状在近年来得到较大改善，但整体上依然面临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投入较少等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企业却热衷于通过各种途径、投入大量资源构建政商网络和政治关联，以获得政府（官员）特别扶持或庇护，进而谋求在市场中的不对等竞争地位（Cai et al., 2011；余明桂等，2010）。这既是对市场环境和公平竞争的破坏，也严重恶化了政商生态系统。正因为如此，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普遍存在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选择：市场化策略（market strategy）和非市场化策略（non-market strategy）。前者指企业注重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等创新路径培育内生增长能力，进而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后者则指企业热衷于通过构建政治关系网络，甚至是游说、贿赂官员等手段谋求政府支持或庇护，以在市场中获得不对等竞争地位（Markman & Buchholtz, 2009；Iriyama et al., 2016）。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特征（Aghion et al., 2013；Jia, 2014）、行业

结构（范红忠，2007）和制度环境（Iriyama et al., 2016；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等。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和关系策略导向给予了高度关注（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李新春等，2016），并探讨了创新驱动和关系导向之间的互动关系（Sheremata, 2004；杨其静，2011；周小宇等，2016）。

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重点考察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行为和竞争策略选择并非孤立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La Porta et al., 2000）。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情境维度，官员腐败对市场交易机制和公平竞争环境造成破坏，也是导致畸形政商关系和政企合谋的根源。Dass等（2016）强调，官僚腐败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染特性，它会通过影响组织规则和商业关系塑造企业行为。Paunov（2016）还发现，一方面，腐败环境下的官员索贿和利益攫取行为增加了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服务的成本，因而会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呈现典型的“弱制度”特征，市场机制尚不完备，法律监管效率较低，而且政府干预普遍存在（Allen et al., 2005；Fan et al., 2012），因而政商互动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腐败环境是否对企业竞争策略产生影响？它是否是导致我国企业呈现“创新不足、关系盛行”特征潜在的制度根源^②？如果是，其传导机理是什么？这是

① 2015年黄金周期间，中国消费者出国抢购日本电饭煲、智能马桶等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针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大讨论。此外，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企业/机构百强》榜单，美国入围41家，排名首位；日本入围34家，紧随其后；中国则仅有华为公司一家入围。

② 本文的“关系”特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寻求与政府构建的政治关系。

本文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重点考察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6~2014年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官员腐败确实是驱动我国企业进行政治攀附并忽视创新投入的重要制度诱因。具体来讲,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其越倾向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并抑制“创新驱动”策略;而且,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地区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强度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腐败环境下的企业政治攀附和关系策略行动确实降低了其面临的政治攫取风险,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优惠。我们还发现,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启动的高压反腐败行动产生了积极作用,显著弱化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扭曲效应。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已有经济学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考察腐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分配等的影响效应(Shleifer & Vishny, 1993; Mo, 2001)。与之不同,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实证检验了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这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丰富了腐败主题的研究文献。第二,本研究表明,地区腐败是驱动我国企业进行政治攀附并忽视创新投入的重要制度诱因,深化了对“弱制度”情境下我国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特殊逻辑的理解,也从制度视角为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提供了一个新的合理解释。第三,本研究还发现,腐败环境下的企业政治攀附和关系策略行动确实降低了其面临的政治攫

取风险,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优惠。这也对政治关联主题的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

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 中国腐败形势及其经济后果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改革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央政府不断向下放权的过程。放权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掌握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政策优惠等诸多重要资源,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然而,这些资源分配和权利使用具有很强的不透明性(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特别是我国制度建设并不完善,不少法律条文、行政规则、行政程序等较为模糊,这不仅赋予政府官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审批程序、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对象及额度等),而且权力行使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政府官员获得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导致权力滥用和寻租活动频繁发生。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中国长期位列全球参评国家中的中下游水平,腐败形势较为严峻。

腐败是指“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Shleifer & Vishny, 1993)。它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也弱化了制度基础,因而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

碍”（World Bank, 2000）。针对腐败主题的研究，早期学者重点关注其引发的宏观经济后果，并形成“腐败有害论”和“腐败有效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强调腐败扮演的“沙子”角色，认为腐败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Shleifer & Vishny, 1993; Dong & Torgler, 2012）。后者则认为，腐败扮演了“润滑剂”作用，有利于减少制度摩擦，帮助企业规避无效率的政府管制，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Blackburn & Forgues - Puccio, 2009; Acemoglu & Verdier, 2010）。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腐败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及效率的影响。Fisman 和 Svensson（2007）实证发现，官员腐败阻碍了企业成长速度。Sun（2014）研究发现，腐败会加剧企业避税行为。Birhanu 等（2016）发现，腐败通常伴随着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会增加企业投资的风险，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Paunov（2016）指出，官僚腐败加剧了专利及质量证书的审批成本，降低了企业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进而弱化了企业创新激励。Smith（2016）还发现，腐败环境加剧了政府官员对企业资产的攫取行为，这导致企业有动机实施资产配置策略，以防范和降低政府攫取风险。在国外研究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也开始转向腐败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聂辉华等（2014）研究发现，腐败有利于私营控股企业避开无效管制，对其生产率有正效应。然而，腐败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影响。方明月和聂辉华（2015）研究发现腐败会破坏司法公正，加剧企业契约实施困难。徐业坤和李维安（2016）研究发现，腐败会刺激民营企业投资，尤其是具

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

此外，战略管理相关文献也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腐败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如 Rodriguez 等（2005）和 Uhlenbruck 等（2006）研究发现，腐败会严重影响跨国企业的组织合法性和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策略选择。Brouthers 等（2008）研究发现，更大的市场吸引力有助于降低腐败对寻求市场投资的负面影响，但随着腐败程度的加剧，市场吸引力的积极作用会循序消失。Montiel 等（2012）研究发现，腐败会降低对政府规范企业行为的信任，从而促使企业寻求第三方认证来降低信息不对称。Wan（2005）和 Peng 等（2008）研究认为，为应对腐败的政府环境，企业会采取更多的非市场化战略来代替市场化战略，或增加对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依赖来代替正式关系网络。

（二）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选择

根据战略管理理论的一般观点，企业普遍存在两种竞争策略选择，即市场化策略和非市场化策略：前者指企业借由人力资本、技术研发投资等创新驱动路径培育企业内生增长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后者则指企业热衷于通过构建政治关系网络，甚至是游说、贿赂官员等手段谋求政府支持或庇护，以期在市场中获得不对等竞争地位（Markman & Buchholtz, 2009; Iriyama et al., 2016）。以往文献对两种策略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策略是一种替代的关系。特别是针对新兴国家，创新往往面临较高风险而变得不经济和低效；相反，构建政治关联等关系网络则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帮企业获得稀缺资源赢

得竞争优势 (Xin & Pearce, 1996; Sheremata, 2004)。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两种策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构建政治关联等关系网络可以帮助企业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 从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Gu et al., 2008)。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在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情境下, 企业既可以通过创新驱动谋求成长, 也可以通过与政府构建政治关系获得发展, 即“创新驱动”和“关系导向”是企业获得发展的两种重要手段。然而, 无论是“创新驱动”还是“关系导向”策略均需要耗费大量的企业资源和企业家精力。因此, 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 企业经营者必须在两种竞争策略之间进行权衡。杨其静 (2011) 通过构建竞争模型阐明, 当政府被授予大量资源和较大处置权, 且企业创新成本较高时, 资源有限的企业更热衷于与政府构建政治关系而不是通过创新来获得发展。党力等 (2016) 实证研究发现, 寻求政治关系和提高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陈爽英等 (2010) 研究也表明, 拥有政治关系资本的企业, 在获取发展的政策、信息和资金等资源配置优势后, 更倾向于选择经营风险低、较为稳定和获利快的项目进行投资, 而不愿从事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和风险高的创新投资^①。

转型的中国, 一大主要特征就是“大政府、小市场”。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下, 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 而且因市场机制不完善, 资源和经济机会的获得存在较强

的制度屏障 (Allen et al., 2005; Fan et al., 2012)。这给政治权力介入经济权利分配创造了机会, 并导致资源配置与产权保护存在人际化、身份化倾向 (张建君和张志学, 2005)。在此制度情境下, 腐败环境势必对企业“关系导向”策略的选择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腐败对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产生破坏, 也是导致畸形政商关系和政企合谋的根源。方明月和聂辉华 (2015) 发现, 官员腐败显著影响了企业内外部的契约实施水平。与公平的市场环境相比较, 官员腐败将创造出更多的政企合谋和权力寻租空间, 使寻租机制能更有效地得到发挥, 从而有助于企业通过构建政治关系获得更多的优惠资源 (如在信贷融资、政府采购、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这意味着, 腐败环境下企业将更倾向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 进而抑制“创新驱动”策略。另一方面, 社会与经济转轨过程中, 政府对微观企业活动的干预依然存在。同时, 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Allen et al., 2005), 不少法律条文、行政规则和程序等都比较模糊, 特别是对政府官员权力行使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比较脆弱。地区腐败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资产被腐败官员窥视和侵占的风险 (Durnev & Fauver, 2010; Smith, 2016)。此时, 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动机调动资源构建关系网络和政治关联, 以寻求特殊的“政治保护伞”^②。李捷瑜和黄宇丰 (2010) 发现, 政治关联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权力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给出的宝贵意见。本文旨在揭示地区腐败对企业同一时期两种策略选择的影响, 而非探究企业所获取的政治资源对企业后期创新活动的影响。因此, 本文研究内容并未考虑企业所获取的政治资源对未来企业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

② 诸多研究表明, 中国私营企业家乐于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 (官员) 建立某种特殊的政治联系, 俗称给企业戴上“红帽子” (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8)。

庇护，有利于减少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检查频率和刁难、避免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乱摊派、乱收费”等问题。

与之相反，腐败环境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驱动”策略的实施。一方面，转轨时期，我国法律和司法体系不健全，产权保护薄弱，企业创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Allen et al., 2005）。腐败越严重的地区，企业创新成果越可能面临被竞争者模仿的市场风险，甚至可能面临腐败官员介入而被侵占的政治风险，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李后建和张剑，2015）。Claessens 和 Laeven（2003）发现，腐败会阻碍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弱化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方明月和聂辉华（2015）认为，腐败破坏了司法公正，提高了企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契约争端的交易费用，这会弱化知识产权保护，进而抑制企业创新激励。由此可见，在腐败严重的政商环境下，企业创新成果难以得到强有力的产权保护，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腐败还可能会加剧企业创新成本，降低创新带来的预期回报。Paunov（2016）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将导致企业在专利申请、质量证书审批等过程中向审批机构和官员支付高昂租金。这提升了企业创新活动成本，降低了创新活动预期收益，因此对企业创新激励造成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导向”策略；反之，则越倾向于选择“创新驱动”策略。

（三）产权性质、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

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新兴加转轨”双重制度特征的经济体，拥有特殊的产权制度环境。国有企业与政府天然的利益关系，导致其在行业准入、资源获取、产权保护和政策性扶持等方面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尽管其效率较低。以往诸多研究发现，转型时期的市场和法律制度远未完善，这种情景下腐败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资源配置机制（Fan et al., 2012；孙刚等，2005；聂辉华等，2014），客观上为非国有企业绕开一些无效率的政府管制提供了便利。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构建政治关系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及政府支持，为企业发展谋求更多的保障和机会。实证研究也表明，与政府构建政治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信贷融资（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税收减免（吴文锋等，2009）、政府补贴（余明桂等，2010）等，且有利于企业更容易进入管制行业（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Feng et al., 2015）。

另一方面，我国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并不完善（Allen et al., 2005）。企业（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很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利益攫取和侵害（Cull & Xu, 2005）。Smith（2016）指出，腐败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政府攫取风险更为严重，使得企业有动机采取各种策略防范自身资产被侵占。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关系网络等非正式规则也可为企业利益免受侵害提供一定保障（Bai et al., 2006；Fan et al., 2012；田利辉和张伟，2013）。需要强调的是，与非国有企业的弱势地位不同，国有企业拥有的天然血统使其获得了更多政府庇护，也

面临更少的政府攫取风险。因此，本文预期，与国有企业相比较，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关系导向策略和企业资源投向的影响强度更加明显。基本不受腐败环境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地区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本文将企业竞争策略划分为两种类型——“关系导向”策略和“创新驱动”策略，并构建计量模型（1）：

$$\begin{aligned} Strategy_{it} = & \beta_0 + \beta_1 Corrupt_{it} + \beta_2 Size_{it} + \\ & \beta_3 Lev_{it} + \beta_4 Q_{it} + \beta_5 Age_{it} + \beta_6 Npow_{it} + \beta_7 Separate_{it} + \\ & \beta_8 HHI_{it} + \beta_9 Diversification_{it} + \beta_{10} FD_{it} + \beta_{11} \\ & Law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竞争策略（*Strategy*），通过“关系导向”策略和“创新驱动”策略来反映。其中，“关系导向”策略（*Political*）通过企业是否积极与政府构建政治关系来测度。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情境下企业难以通过政治游说、政治献金等策略搭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而是主要通过聘用前政府官员或高管自身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途径构建政治关系（Jia, 2014）。借鉴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

公司高管团队成员中具有政治关系人员的比例（*Political*）测度企业“关系导向”策略强度。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采用高管团队中具有政治关系的人数作为替代变量，做稳健性测试。企业“创新驱动”策略（*Innovation*）则使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测度。企业投入的研发投入越多，表示“创新驱动”强度越大。由于因变量 *Political* 是取值为0~1的连续变量，且包含部分以正概率取值为0的样本观测值。因此，当因变量为 *Political* 时，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而且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也使用Fractional 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当因变量为 *Innovation* 时，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解释变量：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Corrupt*）。对于腐败程度的度量，目前普遍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构建地区腐败指数，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然而，这种建立在主观感知基础上的腐败指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腐败状况（Knack, 2007）。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被纪检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或者涉案人数作为腐败程度的替代变量。这种方法通常不会受到样本误差或者调查不反馈等问题的影响（Glaeser & Saks, 2006）。近年来，Dong和Torgler（2012）、Smith（2016）、吴一平（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及聂辉华

等 (2014) 均使用该方法测度地区腐败程度^①。借鉴上述文献，本文采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被查处的贪污渎职腐败立案数衡量该地区的腐败程度^②。由于腐败可能会有滞后效应，且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对腐败作了滞后一期处理。

调节变量：产权性质 (*State*)。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时划分为国有企业，取值为 0；将其余企业（包括民营控制和集体控制等所有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1。

控制变量：借鉴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9)、Jia (2014) 等文献，模型中还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企业成长性 (*Q*)、企业年龄 (*Age*)，并使用企业两权分离度控制代理问题 (*Separate*)。此外，模型还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市场份额 (*Npow*)、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 (*HHI*)、企业业务多元化程度 (*Diversification*)、地区金融发展环境 (*FD*)、地区法律环境 (*Law*)，并在模型中对行业和年度效应进行控制。具体变量内涵如表 1 所示。

(二)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06~2014 年数据为基础，剔除金融保险类、ST/PT 公司以及

存在数据缺失观测值，最终得到 15281 个年度—公司观测样本。模型中企业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政治关系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并经手工收集整理。2009 年及以前的地区腐败数据源于《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审计年鉴》；2009 年以后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地方法律年鉴、经济年鉴补充获得，仍有缺失部分进行剔除处理。地区金融发展环境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模型中连续变量进行 1%~99%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描述性统计分析，Panel A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关系导向” (*Political*) 变量均值为 0.052，且最大值为 0.650，这意味着企业“关系导向”策略普遍存在。“创新驱动” (*Innovation*) 变量均值为 0.021，可见我国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整体较低。地区腐败程度 (*Corrupt*) 变量均值为 0.232，且最大值为 0.463，最小值为 0.027。这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腐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为跨区域检验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便利。

① 该方法可能面临一些质疑，认为它反映了反腐败力度，而不是腐败程度。本文采取该指标的原因如下：第一，若腐败立案数反映了反腐败力度，那么用于反腐败的公、检、法、司支出应与腐败立案数正相关。我们收集和计算了各省份人均司法支出，并对各省份人均腐败立案数和人均司法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如图 1 所示。然而，结果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析显示两者在 1% 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 Nie 和 Jia (2011) 研究发现相一致，表明腐败立案数并未反映反腐败力度。第二，从腐败案件与被查处概率间关系来讲，被查处腐败案件越多，显然反映腐败越严重。第三，该指标也是目前腐败研究普遍采用的测度方法，如 Smith (2016)、吴一平 (2008) 以及周黎安等 (2009)。

② 本文地区的腐败程度，是指企业经营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而非企业注册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考虑到一些上市公司会在不同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但企业办公地通常位于其最为重要的业务经营所在地。因此，本文使用企业办公地来表示企业经营所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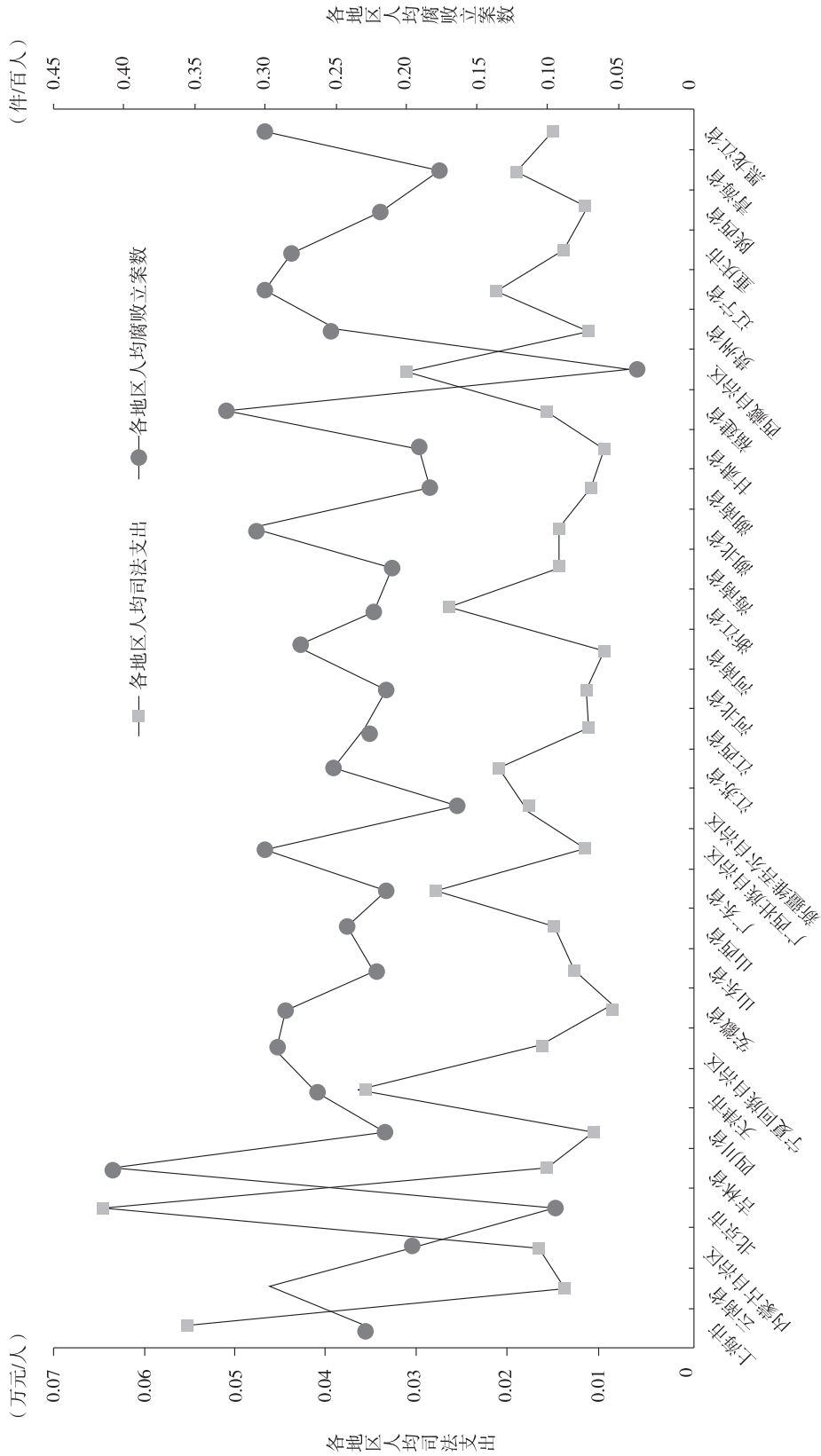


图1 各地区人均腐败立案数与各地区人均司法支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关系导向	<i>Political</i>	高管成员中担任全国（或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数占高管成员总人数的比例
创新驱动	<i>Innovation</i>	创新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地区腐败	<i>Corrupt</i>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职务犯罪立案数/公职人员数（件/百人）
产权性质	<i>State</i>	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1，国有企业取值为 0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i>Lev</i>	企业总负债/总资产
成长性	<i>Q</i>	$(\text{流通股数} \times \text{流通股价格} + \text{非流通股数} \times \text{每股净资产} + \text{总负债}) / \text{总资产}$
企业年龄	<i>Age</i>	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两权分离度	<i>Separate</i>	控股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差值
市场份额	<i>Npov</i>	市场份额等于企业销售收入除以所在行业所有企业销售收入之和
行业竞争程度	<i>HHH</i>	等于行业中所有企业行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HHH = \sum (X_{ij} / \sum X_{ij})^2$ 。其中， X_{ij} 为行业 i 中公司 j 的销售收入。 HHH 越小，竞争越激烈
业务多元化	<i>Diversification</i>	等于占主营业务收入 10% 以上所涉及的行业个数
地区金融环境	<i>FD</i>	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银行年末贷款余额/地区 GDP
地区法律环境	<i>Law</i>	使用樊纲等（2011）市场化进程中市场中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未披露年份使用插值法递推得到
年度虚拟变量	<i>Year</i>	若为某一年份，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行业虚拟变量	<i>Ind</i>	若为某一行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Panel A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Political</i>	15281	0.052	0.037	0.070	0.000	0.650
<i>Innovation</i>	15281	0.021	0.004	0.042	0.000	1.694
<i>Corrupt</i>	15281	0.232	0.231	0.069	0.027	0.463
<i>Size</i>	15281	21.731	21.568	1.247	19.129	25.683
<i>Lev</i>	15281	0.454	0.455	0.225	0.044	1.094
<i>Q</i>	15281	2.047	1.553	1.739	0.211	10.021
<i>Age</i>	15281	2.471	2.565	0.484	0.693	3.219
<i>Separate</i>	15281	0.057	0.000	0.081	0.000	0.534
<i>Npov</i>	15281	0.013	0.003	0.038	0.000	0.914
<i>HHI</i>	15281	0.082	0.056	0.080	0.023	0.836
<i>Diversification</i>	15281	1.794	1.000	1.115	1.000	6.000
<i>FD</i>	15281	1.230	1.090	0.479	0.587	2.555
<i>Law</i>	15281	11.252	8.460	5.507	3.570	19.890

Panel B 单变量差异检验					
变量	分组	<i>Corrupt_low</i>	<i>Corrupt_high</i>	Diff. Mean	Diff. Median
<i>Political</i>	均值	0.051	0.053	-0.002 *	5.655 **
	中值	0.033	0.040		
<i>Innovation</i>	均值	0.023	0.019	0.004 ***	19.640 ***
	中值	0.005	0.003		

注：本表中均值显著性差异的检验方法为 t 检验，中位数显著性差异的检验方法为 Wilcoxon 秩和检验；***、**、*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在 Panel B，本文进一步按照地区腐败严重程度，将样本划分为高腐败组 (*Corrupt_high*) 和低腐败组 (*Corrupt_low*)^①，进行单变量组间差异检验。我们发现，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关系导向” (*Political*)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053 和 0.040；而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关系导向”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051 和 0.033，且分别在 10% 和 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

异。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创新驱动” (*Innovation*)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019 和 0.003；而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创新驱动”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023 和 0.005，且均在 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在高腐败地区，企业“关系导向”较高，但“创新驱动”较低；相反，在低腐败地区，企业“关系导向”较低，但

① 根据地区腐败程度中值对样本进行分组，若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低于样本中值，则为低腐败组 (*Corrupt_low*)；若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高于样本中值，则为高腐败组 (*Corrupt_high*)。

“创新驱动”较高。即在高腐败地区和低腐败地区，“关系导向”和“创新驱动”之间存在相反的关系，从而支持了我们前文的论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

根据计量模型（1），本文首先考察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2）列结果显示，因变量为“关系导向”策略（*Political*）时，自变量“地区腐败程度”（*Corrupt*）的回归系数为0.053（marginal effects为0.028），显著性水平为1%。这意味着，随着所在地区腐败程度的增加，企业会显著提升“关系导向”策略强度。同时，由第（5）列可以发现，因变量为“创新驱动”策略（*Innovation*）时，自变量“地区腐败程度”（*Corrupt*）的回归系数为-0.010，显著性水平为1%，也即地区腐败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驱动”策略的实施。由此可见，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越倾向于构建政治关联、实施“关系导向”策略；相反，“创新驱动”策略和资源投入则得到明显抑

制。进一步，我们在第（3）列和第（6）列中分别控制了 *Innovation* 和 *Political*，发现“关系导向”策略与“创新驱动”策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杨其静（2011）和党力等（2016）研究发现相一致，表明两者存在替代关系。以上结果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强度显著提升，“创新驱动”策略强度则显著下降。托宾Q与两种策略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创新驱动”策略的影响更强，表明高成长性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创新驱动”策略。两权分离度（*Separate*）与两种策略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代理问题越严重，企业可能越倾向于消极不作为。产品市场竞争（*HHI*）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创新驱动”策略，而企业市场份额（*Npov*）会降低“创新驱动”策略强度。企业业务多元化程度（*Diversification*）与企业“关系导向”策略显著正相关；相反，与“创新驱动”策略显著负相关。此外，当地金融发展环境（*FD*）会抑制企业“关系导向”策略的实施，促进企业“创新驱动”策略的实施。与此相仿，当地法律发展环境（*Law*）也有助于企业采取“创新驱动”策略。

表3 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选择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 = <i>Political</i>			因变量 = <i>Innovation</i>		
<i>Corrupt</i>	0.042 *** (2.64)	0.053 *** (2.97)	0.054 *** (3.02)	-0.033 *** (-9.17)	-0.010 *** (-3.22)	-0.010 *** (-3.27)
<i>Innovation</i>			-0.088 ** (-2.04)			

续表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 = <i>Political</i>			因变量 = <i>Innovation</i>		
<i>Political</i>						-0.006 ** (-2.02)
<i>Size</i>		-0.024 *** (-4.36)	-0.021 *** (-3.84)		-0.027 *** (-27.16)	-0.027 *** (-27.02)
<i>Lev</i>		0.001 (1.20)	0.001 (1.03)		0.001 *** (6.59)	0.001 *** (6.57)
<i>Q</i>		-0.018 *** (-8.36)	-0.017 *** (-7.91)		-0.008 *** (-16.56)	-0.008 *** (-16.46)
<i>Age</i>		-0.032 ** (-2.57)	-0.031 ** (-2.49)		-0.010 *** (-4.88)	-0.010 *** (-4.85)
<i>Separate</i>		0.066 (1.40)	0.068 (1.44)		-0.021 *** (-2.79)	-0.021 *** (-2.81)
<i>Npow</i>		-0.014 (-0.27)	-0.021 (-0.39)		0.077 *** (7.01)	0.077 *** (7.01)
<i>HHI</i>		-0.014 (-0.27)	-0.021 (-0.39)		0.077 *** (7.01)	0.077 *** (7.01)
<i>Diversification</i>		0.002 ** (2.42)	0.002 ** (2.51)		-0.001 *** (-6.47)	-0.001 *** (-6.52)
<i>FD</i>		-0.008 ** (-2.52)	-0.008 *** (-2.58)		0.002 *** (3.19)	0.002 *** (3.22)
<i>Law</i>		0.000 (0.43)	0.000 (0.38)		0.000 *** (3.35)	0.000 *** (3.34)
<i>_ cons</i>	-0.004 (-0.36)	-0.144 *** (-5.23)	-0.147 *** (-5.33)	0.002 (1.06)	0.034 *** (6.80)	0.034 *** (6.83)
<i>Year/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5281	15281	15281	15281	15281	15281
<i>R²</i>	0.155	0.308	0.311	0.358	0.451	0.450
<i>F</i>	7.05	10.58	10.40	270.51	235.54	230.46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二) 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选择：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是否因产权性质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将样本公司划分为两组：国有企业 VS 非国有企业，并根据计量模型 (1) 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在第 (1) 列和第 (3) 列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地区腐败程度”对因变量“关系导向”策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系数=0.103，t 值=3.96，marginal

effects=0.057）；相反，“地区腐败程度”对因变量“创新驱动”策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27，t 值=-4.92）。这一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环境显著激发了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导向”策略，并抑制了其“创新驱动”策略。然而，在第 (2) 列和第 (4) 列国有企业样本组中，无论因变量是“关系导向”策略还是“创新驱动”策略，自变量“地区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地区腐败环境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表 4 产权性质、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选择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Political		因变量=Innovation		因变量=Political	因变量=Innovation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Corrupt	0.103 *** (3.96)	-0.014 (-0.56)	-0.027 *** (-4.92)	0.003 (0.88)	0.001 (0.06)	0.023 *** (6.43)
State					-0.004 (-0.48)	0.021 *** (12.20)
State×Corrupt					0.101 *** (3.31)	-0.071 *** (-10.52)
Size	0.011 *** (5.97)	0.011 *** (6.56)	-0.000 (-0.53)	-0.000 (-0.84)	0.011 *** (9.25)	-0.000 (-1.40)
Lev	-0.025 *** (-3.48)	-0.006 (-0.71)	-0.037 *** (-24.44)	-0.012 *** (-10.13)	-0.020 *** (-3.58)	-0.026 *** (-26.24)
Q	0.001 (0.62)	0.001 (0.73)	0.001 *** (3.94)	0.001 *** (4.16)	0.001 (0.72)	0.001 *** (6.15)
Age	-0.017 *** (-6.48)	-0.011 *** (-2.67)	-0.006 *** (-9.45)	-0.009 *** (-10.90)	-0.015 *** (-6.77)	-0.008 *** (-14.69)
Separate	-0.019 (-1.08)	-0.124 *** (-6.47)	-0.018 *** (-4.97)	-0.002 (-0.60)	-0.058 *** (-4.63)	-0.014 *** (-6.36)
Npov	0.079 (0.89)	0.025 (0.44)	0.050 *** (3.26)	-0.031 *** (-4.31)	0.042 (0.89)	-0.013 * (-1.70)

续表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HHI	-0.062 (-0.83)	0.023 (0.29)	0.058*** (3.44)	0.065*** (5.13)	-0.013 (-0.24)	0.075*** (6.96)
Diversification	0.002 (1.58)	0.002* (1.91)	-0.001 (-1.62)	-0.001*** (-6.21)	0.002*** (2.62)	-0.001*** (-6.20)
FD	0.003 (0.59)	-0.011** (-2.56)	0.006*** (4.67)	-0.001 (-1.40)	-0.006* (-1.77)	0.003*** (4.31)
Law	-0.001** (-2.37)	0.000 (0.57)	0.000 (0.43)	0.000*** (3.58)	-0.000 (-0.89)	0.000 (1.54)
_ cons	-0.180*** (-4.34)	-0.210*** (-5.21)	0.024*** (2.72)	0.017*** (3.09)	-0.194*** (-6.75)	0.011** (2.16)
Year/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121	7160	8121	7160	15281	15281
R ²	0.400	0.462	0.448	0.376	0.369	0.460
F	8.40	7.24	145.24	114.49	11.87	232.40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此外，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产权性质和地区腐败的交互项 ($State \times Corrupt$)。回归结果显示，第 (5) 列交互项 $State \times Corrupt$ 对因变量“关系导向”策略的回归系数为 0.101 (marginal effects 为 0.054)，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相反，第 (6) 列交互项 $State \times Corrupt$ 对因变量“创新驱动”策略的回归系数为 -0.071，且在 1% 水平上显著。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我们进一步绘制了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示意图，分别见图 2 和图 3。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相对于国有企业，地区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关系导向”策略和“创新驱动”策略的影响更为强烈。综上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地区腐败环境对“关系导向”策略

的促进作用和“创新驱动”策略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也即地区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以上结果为假设 2 提供了证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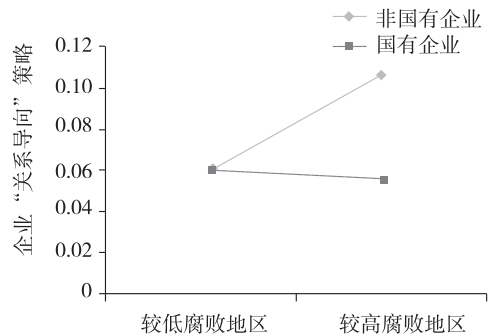


图 2 产权性质对地区腐败与企业“关系导向”策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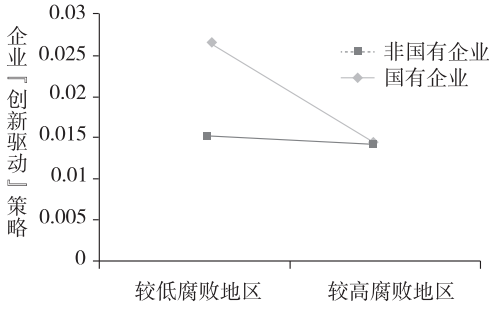


图3 产权性质对地区腐败与企业“创新驱动”策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 拓展型检验：影响机制

前文分析表明，腐败环境不仅会加剧企业资源的政治攫取风险，而且地方政府掌握的丰富资源也可能诱导更多的政治攀附和关系活动。因此，腐败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的主要动因是谋求政府庇护，降低政府攫取风险，并获得行业准入、信贷融资、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鉴于此，本文将对腐败环境下企业积极实施“关系导向”策略的影响机制做进一步验证，以为本文结论提供更为有力的佐证。

1. “规避政治攫取风险”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腐败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的一个主要动因是降低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和利益侵占。虽然官员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企业资源被政府“利益攫取”的风险可能越大，但相关的实证检验却较为罕见，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被政府“利益攫取”风险的度量较为困难。近来，Smith (2016) 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的政治攫取风险较高时，会隐匿企业资产流动性，持有更少的现金，并将资金投放于更难以被侵占的“硬资产”（如房产、厂房、设备及库存）。借鉴他们的研究，本文将

资产隐藏作为企业被政府“利益攫取”风险的度量，检验地区腐败越严重环境下，企业面临的“利益攫取”风险是否越大，以及实施“关系导向”策略是否能弱化“利益攫取”风险。借鉴 Smith (2016) 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硬资产”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分别构建模型 (2) 和模型 (3)，如下：

$$Cash_{it} = \beta_0 + \beta_1 Corrupt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CF_{it} + \beta_5 NWC_{it} + \beta_6 Capex_{it} + \beta_7 Growth_{it} + \beta_8 Di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PPE_{it} = \beta_0 + \beta_1 Corrupt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BIT_{it} + \beta_5 Growth_{it} + \beta_6 Q_{it} + \beta_7 Age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 (2) 中，因变量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Cash$)，等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总资产。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经营现金流 (CF)、净营运资本 (NWC)、资本支出 ($Capex$)、销售增长率 ($Growth$)、股利支付率 (Div) 等。模型 (3) 中，因变量为企业“硬资产”投入水平，等于固定资产及库存之和除以总资产。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经营现金流 (CF)、息税前利润 ($EBIT$)、企业成长性 (Q)、企业年龄 (Age) 等。实证结果见表 5。

表 5 第 (1) 列检验了腐败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地区腐败程度 ($Corrupt$) 回归系数为 -0.107 ，且在 1% 水平显著，这与 Smith (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地区腐败环境越严重，企业被“利益攫取”的风险越大，企业为规避被“利益攫取”风险会隐藏流动性资产，持有更少现金。在第 (2)

列和第 (3) 列, 本文根据企业“关系导向”策略的实施强度, 将样本划分为“关系导向”策略较高组 (*Political_high*) 和“关系导向”策略较低组 (*Political_low*), 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第 (2) 列和第 (3) 列 *Corrupt* 回归系数分别为-0.079 和-0.134, 分别在 5% 和 1% 水平显著, 且 Chow test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在 10% 水平显著 ($P=0.064$), 表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较强的企业被“利益攫取”的风险显著低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较弱的企业。

进一步, 我们检验地区腐败越严重时, 企业资金的投资去向, 回归结果见第 (4) 列。结果显示, 地区腐败程度 (*Corrupt*) 回归系数为

0.097, 且在 1% 水平显著, 这与 Smith (2016) 的研究一致, 即企业为避免被腐败政府“利益攫取”的风险, 会隐藏流动性资产, 将资金投放于更难以被侵占的“硬资产”上。然而, 第 (5) 列和第 (6) 列 *Corrupt* 回归系数分别为 0.054 和 0.138, 分别不显著和在 1% 水平显著, 且 Chow test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在 10% 水平显著 ($P=0.056$), 进一步支持了模型 (2) 回归结果。以上表明: 地区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 企业被“利益攫取”风险越大; 此时, 企业实施“关系导向”策略, 能够有助于弱化被政府“利益攫取”的风险。

表 5 “规避利益攫取”机制检验

因变量	(1)	(2)	(3)	因变量	(4)	(5)	(6)
	因变量=Cash				因变量=PPE		
	全样本	<i>Political_high</i>	<i>Political_low</i>		全样本	<i>Political_high</i>	<i>Political_low</i>
<i>Corrupt</i>	-0.107*** (-4.14)	-0.079** (-2.35)	-0.134*** (-3.88)	<i>Corrupt</i>	0.097** (2.42)	0.054 (1.02)	0.138*** (2.64)
<i>Size</i>	-0.004** (-2.29)	-0.003 (-1.42)	-0.005* (-1.93)	<i>Size</i>	0.009*** (2.82)	0.007 (1.62)	0.012*** (2.76)
<i>Lev</i>	0.074*** (4.97)	0.091*** (4.58)	0.061*** (3.25)	<i>Lev</i>	0.077*** (4.73)	0.090*** (4.22)	0.068*** (3.28)
<i>CF</i>	0.372*** (19.72)	0.391*** (15.23)	0.356*** (14.05)	<i>EBIT</i>	-0.208*** (-4.79)	-0.173*** (-2.65)	-0.232*** (-4.37)
<i>Nwc</i>	0.416*** (35.82)	0.435*** (27.32)	0.400*** (27.00)	<i>Growth</i>	-0.026*** (-5.46)	-0.030*** (-4.32)	-0.022*** (-3.49)
<i>Capex</i>	-0.107*** (-4.71)	-0.150*** (-4.85)	-0.071** (-2.33)	<i>Q</i>	-0.006*** (-3.23)	-0.009*** (-2.90)	-0.004* (-1.87)
<i>Growth</i>	0.007*** (5.28)	0.009*** (4.88)	0.006*** (3.39)	<i>Age</i>	0.009 (1.55)	0.013* (1.83)	0.003 (0.33)

续表

因变量	(1)	(2)	(3)	因变量	(4)	(5)	(6)
	因变量 = Cash				因变量 = PPE		
	全样本	<i>Political_high</i>	<i>Political_low</i>		全样本	<i>Political_high</i>	<i>Political_low</i>
<i>Div</i>	0.000 (0.11)	0.001 (0.94)	-0.001 (-0.93)	<i>_ cons</i>	0.115 (1.55)	0.122 (1.30)	0.107 (1.07)
<i>_ cons</i>	0.152 *** (3.65)	0.126 ** (2.40)	0.170 *** (2.93)				
<i>Year/Ind</i>	Yes	Yes	Yes	<i>Year/Ind</i>	Yes	Yes	Yes
<i>Chow test</i>	<i>P</i> = 0.064			<i>Chow test</i>	<i>P</i> = 0.056		
<i>N</i>	13866	6647	7219	<i>N</i>	13866	6647	7219
<i>F</i>	0.555	0.582	0.537	<i>F</i>	0.397	0.386	0.413
<i>R</i> ²	119.15	78.62	63.21	<i>R</i> ²	65.99	47.87	37.02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2. “获取更多政府优惠待遇” 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腐败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的另一个主要动因是获取在行业准入、信贷融资、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与公平市场环境相比，腐败将创造出更多寻租机会，使寻租机制更有效得以发挥。借鉴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吴文锋等（2009）、田利辉和张伟（2013）以及 Feng 等（2015）的研究，本文分别构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以检验地区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关系导向策略是否越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政府补贴以及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

$$Loan_{it} = \beta_0 + \beta_1 Political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Roa_{it} + \beta_5 Growth_{it} + \beta_6 Q_{it} + \beta_7 Ta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Subsidy_{it} = \beta_0 + \beta_1 Political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BIT_{it} + \beta_5 Q_{it} + \beta_6 Age_{it} + \beta_7 Growth_{it} + \beta_8 Ta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ETR_{it} = \beta_0 + \beta_1 Political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BIT_{it} + \beta_5 Q_{it} + \beta_6 Growth_{it} + \beta_7 Tang_{it} + \beta_8 Invt_{it} + \beta_9 Dep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为银行信贷（*Loan*），等于企业长期借款加短期借款除以总资产。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销售增长率（*Growth*）、企业成长性（*Q*）、资本密集度（*Tang*）等；模型（5）中，被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Subsidy*），等于政府补贴（扣除增值税返还）除以营业收入。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息税前利润（*EBIT*）、企业成长性（*Q*）、销售增长率（*Growth*）、企业年龄（*Age*）、资本密集度（*Tang*）等；模型（6）中，被解释变量为实际税率（*ETR*），等于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

费用除以息税前利润。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息税前利润 (*EBIT*)、企业成长性 (*Q*)、销售增长率 (*Growth*)、资本密集度 (*Tang*)、存货密集度 (*Invint*)、税盾 (*Dep*) 等。实证结果见表 6。

表 6 中，本文按照地区腐败严重程度，将样本划分为高腐败地区组 (*Corrupt_high*) 和低腐败地区组 (*Corrupt_low*)，进行分组回归。第 (1)~(2) 列报告了地区腐败、“关系导向”策略与银行信贷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高腐败地区组和低腐败地区组，企业“关系导向”策略 (*Political*)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8 和 -0.013，分别在 1% 水平显著和不显著，且 Chow test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在 5% 水平显著 ($P=0.012$)。以上结果表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且地区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企业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带来的信贷资源越多。

第 (3)~(4) 列报告了地区腐败、“关系

导向”策略与政府补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高腐败地区组和低腐败地区组，企业“关系导向”策略 (*Political*)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755 和 0.152，分别在 5% 水平显著和不显著，且 Chow test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在 10% 水平显著 ($P=0.089$)。以上结果表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且地区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企业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带来的政府补贴越多。

第 (5)~(6) 列报告了地区腐败、“关系导向”策略与税收优惠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高腐败地区组和低腐败地区组，企业“关系导向”策略 (*Political*)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10 和 0.013，分别在 5% 水平显著和不显著，且 Chow test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在 10% 水平显著 ($P=0.076$)。以上结果表明：实施“关系导向”策略有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即实际税率更低），且地区腐败越严重的环境下，企业实施“关系导向”策略带来的税收优惠越多。

表 6 “获取更多政府优惠待遇”机制检验

因变量	(1)	(2)	(3)	(4)	(5)	(6)
	因变量 = <i>Loan</i>		因变量 = <i>Subsidy</i>		因变量 = <i>ETR</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Political</i>	0.038*** (2.62)	-0.013 (-0.91)	0.755** (2.26)	0.152 (0.51)	-0.110** (-2.00)	0.013 (0.25)
<i>Size</i>	-0.017*** (-12.03)	-0.016*** (-14.02)	-0.167*** (-5.76)	-0.097*** (-3.87)	0.008* (1.70)	0.015*** (3.79)
<i>Lev</i>	0.286*** (32.36)	0.301*** (36.11)	-0.203 (-1.09)	-0.284 (-1.55)	-0.055** (-2.28)	-0.084*** (-3.47)
<i>Growth</i>	-0.003 (-0.75)	-0.001 (-0.23)	-0.331*** (-3.08)	-0.477*** (-5.68)	0.009 (0.64)	0.017 (1.09)

续表

因变量	(1)	(2)	(3)	(4)	(5)	(6)
	因变量 = <i>Loan</i>		因变量 = <i>Subsidy</i>		因变量 = <i>ETR</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Corrupt_high</i>	<i>Corrupt_low</i>
<i>Q</i>	-0.009*** (-8.50)	-0.007*** (-6.09)	0.183*** (6.56)	0.173*** (6.32)	-0.007* (-1.93)	-0.006** (-2.23)
<i>Tang</i>	0.038*** (4.20)	0.041*** (4.65)	0.615*** (3.60)	0.782*** (4.24)	-0.058 (-1.61)	-0.086** (-2.28)
<i>Roa</i>	-0.181*** (-6.03)	-0.109*** (-4.02)				
<i>EBIT</i>			0.465 (0.78)	-1.251** (-2.29)	0.399*** (5.17)	0.359*** (4.60)
<i>Age</i>			-0.046 (-0.83)	-0.212*** (-4.30)		
<i>Invint</i>					-0.047 (-1.33)	-0.061 (-1.63)
<i>Dep</i>					-0.849** (-2.18)	-0.714* (-1.82)
<i>_ cons</i>	0.420*** (9.50)	0.368*** (12.43)	4.777*** (6.50)	3.670*** (5.74)	0.055 (0.50)	-0.140 (-1.50)
<i>Year/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how test</i>	<i>P</i> =0.012		<i>P</i> =0.089		<i>P</i> =0.076	
<i>N</i>	7131	7084	6601	6544	7081	7011
<i>F</i>	0.411	0.445	0.113	0.108	0.020	0.023
<i>R</i> ²	126.29	132.92	26.42	23.16	9.68	11.55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四) 稳健性检验

1. 高强度反腐败行动的影响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启动了“八项规定”“六大禁令”和“反四风”等新一轮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倡导构建“清”“亲”新型政商关系。王贤彬等（2016）研究发现，高压反腐行动下，高官频繁落马具有威慑效应，

能够有效抑制官员腐败和权力寻租。随着反腐败行动的深入，权力寻租和政企合谋的空间大大降低，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可能也会趋于弱化。为消除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对实证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以 2012 年为临界点，将样本细分为反腐前与反腐后，这也有助于检验反腐行动对

微观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反腐行动前，地区腐败会显著促进企业采取“关系导向”策略，通过政治攀附行动积极构建政治关系；相反，地区腐败会严重抑制企业“创新驱动”策略，这与前文一致。然而，反腐行动后，地区腐败对企业“关系导向”策略及“创新驱动”策略均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行动的威慑效应，显著影响了企业原有竞争策略选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区腐败环境对

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扭曲效应，有利于企业将资金和精力从依靠关系的寻租活动逐渐转移回至生产性创新活动。此外，我们进一步使用倍差法 (DID)，将反腐前，高腐败地区的企业作为实验组 (Treated=1)，低腐败地区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Treated=0)；Post 反腐之后的年份取值为 1，反腐之前的年份取值为 0。回归结果见第 (5) 列和第 (6) 列，我们发现交叉项 $Post \times Treated$ 的系数分别为 -0.002 和 0.002，且前者 T 值为 -0.95，后者在 1% 水平显著，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表 7 基于反腐背景的检验结果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反腐前	反腐后	反腐前	反腐后		
Corrupt	0.082 *** (3.72)	0.021 (0.60)	-0.012 *** (-3.51)	-0.000 (-0.03)		
Post					0.013 *** (4.78)	0.023 *** (24.50)
Treated					0.003 ** (1.96)	-0.001 * (-1.91)
Post×Treated					-0.002 (-0.95)	0.002 *** (2.61)
Size	0.011 *** (7.44)	0.005 ** (2.19)	-0.001 *** (-5.70)	0.001 ** (2.16)	0.005 *** (6.88)	-0.001 *** (-3.76)
Lev	-0.026 *** (-3.97)	-0.016 (-1.43)	-0.026 *** (-24.63)	-0.033 *** (-13.67)	-0.016 *** (-5.77)	-0.027 *** (-27.17)
Q	0.002 ** (2.13)	-0.002 (-1.07)	0.001 *** (3.65)	0.002 *** (4.48)	0.001 * (1.81)	0.001 *** (6.65)
Age	-0.018 *** (-6.77)	-0.022 *** (-4.92)	-0.008 *** (-15.01)	-0.009 *** (-8.13)	-0.008 *** (-6.70)	-0.009 *** (-16.75)
Separate	-0.036 ** (-2.33)	-0.019 (-0.81)	-0.009 *** (-3.78)	-0.010 ** (-2.06)	-0.013 ** (-2.02)	-0.010 *** (-4.88)

续表

Strategy	(1)	(2)	(3)	(4)	(5)	(6)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因变量 = Political	因变量 = Innovation
	反腐前	反腐后	反腐前	反腐后		
<i>Npow</i>	0.015 (0.25)	0.196 ** (2.17)	-0.007 (-0.88)	-0.081 *** (-4.78)	0.038 (1.32)	-0.021 *** (-2.78)
<i>HHI</i>	0.007 (0.11)	-0.033 (-0.12)	0.054 *** (4.53)	0.031 (0.36)	-0.002 (-0.09)	0.076 *** (6.94)
<i>Diversification</i>	0.002 * (1.84)	0.004 ** (2.16)	-0.001 *** (-4.97)	-0.002 *** (-4.88)	0.001 ** (2.46)	-0.001 *** (-6.52)
<i>FD</i>	-0.009 ** (-2.34)	-0.006 (-1.01)	0.002 *** (2.60)	0.004 ** (2.49)	-0.005 *** (-3.33)	0.003 *** (4.39)
<i>Law</i>	0.000 (1.24)	-0.000 (-0.32)	0.000 *** (3.03)	0.000 (0.77)	0.000 (0.97)	0.000 *** (2.99)
<i>_ cons</i>	-0.193 *** (-5.47)	-0.044 (-0.76)	0.046 *** (8.67)	0.029 ** (2.15)	-0.014 (-0.93)	0.031 *** (6.32)
<i>Year/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0924	4357	10924	4357	15281	15281
<i>R²</i>	0.285	0.252	0.418	0.473	0.023	0.449
<i>F/ Wald</i>	8.89	3.70	141.20	118.48	11.02	229.78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2. 内生性问题

前文研究表明，地区腐败环境是导致我国企业“创新不足、关系盛行”的重要制度根源。但企业积极实施“关系导向”策略，也可能是诱发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即地区腐败与企业竞争策略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借鉴徐业坤和李维安（2016）的研究，本文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为腐败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其中，行政性收费收入（*Fee*）等于地方财政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除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罚没收入（*Fine*）

等于地方财政罚没收入除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8，第（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Fee*）以及罚没收入（*Fine*）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T 值分别为 17.30、16.06），弱工具变量检验 F 统计量为 214.19（P 值为 0.00），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的 P 值为 0.240，表明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因此，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2）列和第（3）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地区腐败与企业

“关系导向”策略显著正相关，与“创新驱动”策略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结果一致。此外，本文借鉴陈刚和李树（2012）的研究，使用官员（省长或省委书记）异地交流（*Exchange*）

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①，结果也与前文一致。因此，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8 内生性问题：两阶段回归结果

因变量	(1)	(2)	(3)
	因变量 = <i>Corrupt</i>	因变量 = <i>Political</i>	因变量 = <i>Innovation</i>
<i>Fine</i>	0.341 *** (17.30)		
<i>Fee</i>	0.970 *** (16.06)		
<i>Corrupt</i>		0.308 *** (6.30)	-0.074 *** (-4.42)
<i>Size</i>	-0.002 *** (-4.74)	0.006 *** (9.18)	-0.000 (-0.60)
<i>Lev</i>	0.011 *** (4.35)	-0.022 *** (-7.90)	-0.041 *** (-35.67)
<i>Q</i>	-0.001 *** (-4.46)	0.001 ** (2.46)	0.001 *** (6.44)
<i>Age</i>	0.010 *** (10.36)	-0.010 *** (-8.01)	-0.005 *** (-8.75)
<i>Separate</i>	0.003 (0.49)	-0.012 * (-1.74)	-0.019 *** (-7.89)
<i>Npow</i>	-0.017 (-0.87)	0.038 (1.64)	-0.116 *** (-17.88)
<i>HHI</i>	-0.038 *** (-5.81)	-0.011 (-1.36)	0.026 *** (6.85)
<i>Diversification</i>	0.002 *** (5.00)	-0.000 (-0.35)	-0.003 *** (-19.22)

① 陈刚和李树（2012）使用1998~2009年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交流为样本，研究发现官员交流客观上限制了官员在同一地区（或部门）的任期，有助于破除官员因长时间在同一地区（或部门）任职而结成的“利益型关系网络”，进而减少腐败现象。同时，中国省长和省委书记通常由中央直接任命，受微观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较弱。因此，理应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续表

因变量	(1)	(2)	(3)
	因变量 = <i>Corrupt</i>	因变量 = <i>Political</i>	因变量 = <i>Innovation</i>
<i>FD</i>	-0.053 *** (-38.18)	0.016 *** (4.25)	0.000 (0.07)
<i>Law</i>	0.002 *** (18.08)	0.000 (0.14)	0.001 *** (11.04)
_ <i>cons</i>	0.253 *** (20.49)	-0.128 *** (-5.75)	0.068 *** (8.82)
<i>Year/Ind</i>	Yes	Yes	Yes
<i>N</i>	15281	15281	15281
<i>R</i> ²	0.294	0.055	0.226
<i>F</i>	576.82	20.64	321.85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值。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前文因变量为 *Political* 时，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一步使用 Fractional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采用高管团队中具有政治关系的人数来度量企业“关系导向”策略强度，发现结果依然稳健。最后，我们也采用各地区腐败涉案金额测度地区腐败程度，研究结论依然不变。

五、结论与启示

转型经济与“弱制度”情境下，地方政府依然掌握较多资源和自由裁量权。这给行政力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创造了机会，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及企业间竞争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重点考察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

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 A 股上市公司 2006~2014 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腐败环境确实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导向”策略，进而抑制“创新驱动”策略。而且，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地区腐败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进一步检验还发现，腐败环境下的关系导向策略降低了企业面临的政治攫取风险，并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优惠待遇。此外，本文还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行动具有积极作用，弱化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扭曲效应。本研究揭示了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潜在制度成因，从制度视角为我国企业“重关系、轻创新”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合理解释；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丰富了腐败主题的研究文献。

本文结论的启示如下：①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腐败是致使我国企业“创新不足、关系盛行”的一个潜在原因。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培育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企业创新成果，提高企业创新激励。②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发现地区腐败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扭曲效应，也为“转方式，调结构”背景下“反腐有利论”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接受编辑：路江涌

收稿日期：2017年9月19日

接受日期：2018年3月2日）

参考文献

- [1] 陈冬华：《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2003年第9期。
- [2] 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邵云飞：《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 [3] 陈刚、李树：《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世界经济》，2012年第2期。
- [4]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 [5] 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 [6] 方明月、聂辉华：《腐败对企业契约实施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4期。
- [7]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 [8] 李后建、张剑：《腐败与企业创新：润滑剂抑或绊脚石》，《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
- [9] 李捷瑜、黄宇丰：《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 [10]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牢笼的束缚与抗争：地区关系文化与创业企业的关系战略》，《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 [11] 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 [12] 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 [13] 聂辉华、张彧、江艇：《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5期。
- [14] 孙刚、陆铭、张吉鹏：《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 [15] 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 [16] 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高官落马遏制腐败了吗？——来自震慑效应的解释》，《世界经济文汇》，2016年第2期。
- [17]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 [18] 吴一平：《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 [19] 徐业坤、李维安：《腐败：私有投资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2期。

[20] 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21]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22] 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23] 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24]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策——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

[25] 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26] 周小宇、符国群、王锐：《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是相互替代还是互为补充——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4期。

[27] Acemoglu, D., & Verdier, T. 2010. Property rights, corrup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Economic Journal*, 108 (450), 1381-1403.

[28] Aghion, P., Reenen, J. V., & Zingales, L. 2013.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1), 277-304.

[29] Allen, F., Qian, J., & Qian, M.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1), 57-116.

[30] Bai, C. E., Lu, J., & Tao, Z. 2006.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4 (4), 611-628.

[31] Birhanu, A. G., Gambardella, A., & Valentini, G. 2016. Bribery and investment: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9), 1865-1877.

[32] Blackburn, K., & Forgues-Puccio G. F. 2009. — 74 —

Why is corruption less harmful in some countries than in othe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2 (3), 797-810.

[33] Brouthers, L. E., Gao, Y., & Mcnicol, J. P. 2008. Corruption and market attractiveness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FDI.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 (6), 673-680.

[34] Cai, H., Fang, H., & Xu, L. C. 2014.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Food & Machinery*, 54 (1), 55-78.

[35] Claessens, S., & Laeven, L. 2003.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e*, 58 (6), 2401-2436.

[36] Cull, R., & Xu, L. C. 2005. Institutions, ownership, and fin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1), 117-146.

[37] Dass, N., Nanda, V. K., & Xiao, S. C. 2015. *The culture of corruption and the valu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38] Dong, B., & Torgler, B. 2012.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4 (6), 932-947.

[39] Durnev, A., & Fauver, L. 2008. *Stealing from thieves: Firm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when states are predatory*. McGill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40] Fan, J., Titman, S., & Twite, G. 2012.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debt maturity cho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47 (1), 23-56.

[41] Feng, X., Johansson, A. C., & Zhang T. 2015. Mixing business with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59, 220-235.

[42] Fisman, R., & Svensson, J. 2007.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 (1), 63-75.

[43] Glaeser, E. L., & Saks, R. E. 2006. Corrupt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 (6-7), 1053-1072.

[44] Gu, F. F., Hung, K., & Tse, D. K. 2008. When does guanxi matter? Issues of capitalization and its dark sides. *Journal of Marketing*, 72 (4), 12-28.

[45] Iriyama, A., Kishore, R., & Talukdar, D. 2016. Playing dirty or building capability? Corruption and HR training as competitive actions to threats from informal and foreign firm rival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0), 2152-2173.

[46] Jia, N. 2014.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2), 292-315.

[47] Knack, S. 2007. Measuring Corruption: A critique of indicator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7 (3), 255-291.

[48] La Porta, R., Lopez - De - 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2000.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1-2), 3-27.

[49] Markman, G. D., & Buchholtz, A. K. 2009. Factor-market rival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 (3): 322-341.

[50] Mo, P. H. 2001.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1), 66-79.

[51] Montiel, I., Husted, B. W., & Christmann, P. 2012. Using private management standard certification to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 corrupt environ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3 (9), 1103 - 1113.

[52] Nie, H. H., & Jia, R. X. 2011.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orking Paper.

[53] Paunov, C. 2016. Corruption's asymmetric impacts on firm innov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8, 216-231.

[54] Peng, M. W., Wang, D. Y. L., & Jiang, Y. 2008.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5), 920-936.

[55] Rodriguez, P., Uhlenbruck, K., & Eden, L. 2005.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the entry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 (2), 383-396.

[56] Sheremata, W. A. 2004.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in network markets: Strategies for challen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 (3), 359-377.

[57] Shleifer, A., & Vishny, R. W. 1993.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599-617.

[58] Smith, J. D. 2016. US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firm finan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1 (2), 350-367.

[59] Sun, Y. 2014.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 Clems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60] Uhlenbruck, K., Rodriguez, P., Doh, J., & Eden, L. 2006.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entry strategy: Evidence from telecommunication projec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7 (3), 402-414.

[61] Wan, W. P. 2005. Country resource environ-

ments, firm capabilities,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2 (1), 161-182.

[62] World Bank. 2000. *The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cy debate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63] Xin, K. R., & Pearce J. L. 1996.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 (6), 1641-1658.